

Tian Han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二十
世
纪
文
化
名
人
与
上
海

田 汉

中国
话
剧
的
奠
基
人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二十世紀
文化名人与上海

田
汉

邹平著

方全林主编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田汉：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方全林 主编

邹 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8 字数 158,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序

方全林

20 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实际上都可看作是一种文化转型期。这是一个文化上承先启后的时代。新旧共存、争斗、交替,中西碰撞、排斥、融汇,使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目。现在,20 世纪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在 21 世纪的门槛前,回首一番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21 世纪的文化建设,无疑有必要从 20 世纪的文化历程中吸取经验,也吸取教训。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在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有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20 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变便有了不同。上海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而“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对于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应该是一种十分富有意味的视角。

由于“江海通津”的地理位置，由于上海经济的繁荣和文化市场的发达，也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格局，使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人聚集之地。中国进步新文化的先驱和奠基者鲁迅、郭沫若、茅盾，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聂耳、冼星海，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中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邹韬奋，中国电影的最早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大师周信芳，中国现代美术巨匠刘海粟——都在上海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足迹。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间，上海为各种文化人提供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生存条件，也为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提供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环境。在 20 世纪前期的几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文化人从全国各地向上海汇集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由此起步。这一运动初起时虽然以北京为中心，但由于北洋军阀的箝禁与镇压，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因素，不久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便开始向上海转移。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文化人也纷纷奔赴上海，把上海作为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1927 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的政治情势发生剧变，而上海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又成为各类文化人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最佳之地。从 1927 年到 1937 年的整整十年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那样活跃着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各种文化工作者。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常年集中在上海并积极开

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遂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呈一时之盛。“卢沟桥事变”后,文化人汇聚上海又掀起一次高潮,那一时期,上海的抗战文化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上海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不屈强暴的一种象征,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由于上海在这几个时期都成为各种文化人从事活动的舞台,就使得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与上海发生过深浅不一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留下辉煌业绩的文化名人,多数都在上海这个城市留下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脚印,多数都与上海有着或长或短的因缘。上海之所以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几代全国最优秀的文化人士都曾经生活在上海,并在这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创造同时也相互制约的关系,上海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方式,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又直接构成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在总体上营造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上海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鲁迅为例,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鲁迅从1927年定居上海到

1936年辞世，都一直生活、劳作和战斗在这座城市。鲁迅文化生涯中的一半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还办刊物、出丛书，介绍外国文学和美术。在这九年里，鲁迅与上海之间决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关系。上海特定的社会政治格局和文化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鲁迅文化活动的方向和方式。最后九年的鲁迅，关心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形成怎样的思想观念，等等，都与当时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鲁迅的存在，也对上海当时的文化气候和文学状况产生着明显的影响。由于有了鲁迅，在那九年间，上海文化界，尤其上海文学界，多了一点正气而少了一点邪气；多了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少了一些消极病态恶浊的东西。曾经有人指出，由于有了鲁迅的存在，当时上海的某些文人生活上都要检点些，惟恐丑行劣迹遭到鲁迅的嘲讽、斥责。于此也可见，鲁迅与上海文化之间，实在有着很内在的关系。

说到上海当年的文化地位，说到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上海当年所具有的那种文化精神，那种文化襟怀。文化上巨大的包容性，是这座城市能为中国现代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数十年间，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文化潮流、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可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士，

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正因为上海具有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雅量，才使得怀有不同文化理想和艺术趣味的文化人士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上海这块地域则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与众多的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上海的文化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着在这里生活和创造的各种文化人——上海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使得这些文化名人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创造，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怎样在这里生活和创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是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在

这里说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精神气候对艺术创作的左右,这种看法也同样适合于总体的文化创造。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具有的精神气候,对栖身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无疑起着制约作用。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上海这座城市精神气候的制约,研究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面目。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过程而不断曲折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曾出现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出现过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最后历史选择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条道路。研究上海与文化名人的关系,有助于文化人、青年人进一步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由之路,对塑造新一代文化人的健全人格,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起着积极的影响,因为贯穿文化名人与上海关系中的主流因素,是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与祖国在一起,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格。同时对于上海未来的文化建设也自能提供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能从邹韬奋的新闻生涯中总结出进步新闻工作的规律;从张元济办出版社的过程中,抽象出出版如何保持高品位,保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周信芳舞台活动中,领悟出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的若干做法。回眸既往世纪的文化历程,正是着眼于未来世纪上海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可以少走弯路;同时,能激发上海市民、文化人对上海的自豪和热爱,激励和增强建设上

海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自信心,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每一个人那里,情形又都不尽相同。只有对每个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性的微观研究,才能在总体上对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的关系有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把握。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出版一套“20 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

1998 年 12 月

目 录

序	方全林
第 一 章 行走在荆棘路上	(1)
第 二 章 艰难创业南国社	(18)
第 三 章 艺术鱼龙会震动上海滩	(40)
第 四 章 “我们是波希米亚人”	(64)
第 五 章 风风雨雨南国情	(93)
第 六 章 左翼戏剧狂飚申城	(129)
第 七 章 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145)
第 八 章 南京演戏与上海剧人	(168)
第 九 章 在救亡戏剧运动中	(196)
第 十 章 重回上海《丽人行》	(215)
第十一章 十年悲喜《关汉卿》	(235)
第十二章 一代英名田汉魂	(256)

第一章

行走在荆棘路上

1922 年秋天，留学日本六年的田汉，接受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的聘职，携已怀孕的妻子易漱瑜回到了上海。

海上的天气一直不好，风簸浪颠的，闹得漱瑜一路呕吐，等到船靠上海码头时，已是身体虚软得站不稳。田汉扶起她慢慢走下船。秋风萧萧瑟瑟地吹着，漱瑜无力地偎依在田汉身边，欣慰地说道：“我们的孩子终于能出生在自己的祖国了。”

田汉爱怜地拍拍她的手，说：“回来了！我们终于到家了。”

田汉 1898 年 3 月 12 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墩的一个农户家里，原名田寿昌。父亲很早就病亡，全靠母亲的辛劳支撑和舅父易梅臣的救济，田汉才断断续续地读完小学。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和三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去考修业中学，四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把田寿昌改名为田汉，和其他三位改的名字连起

来念，恰好是“英雄怀汉”，表达了他们年青人反清的情绪。1912年2月，田汉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受到校长徐特立的关心和帮助。田汉因家贫而没钱买蚊帐，晚上被蚊子咬得无法入睡，影响了白天上课。徐校长知道后，用自己的工资替他买了一顶蚊帐，还把自己的购书折子借给他，让他到书店里挑选喜爱的书籍。经过五年勤奋的学习，田汉终于毕业了。他的许多同学都迫于生计，纷纷去教育界谋职以分担家庭的重负。田汉很想继续求学，可又不忍心让母亲再为他吃苦受累。再说，上大学需要很多钱，母亲根本负担不起。正在为难之际，三舅易梅臣回来知道此事，便让田汉随他去日本留学。那会儿，易梅臣刚当上湖南留日学生的经理员。就这样，田汉告别了母亲，告别了相爱的表妹易漱瑜，登上了长江的小火轮，离开了夜幕笼罩的长沙城。

田汉对上海并不陌生。留学日本期间，他曾两次在上海逗留，对这座喧嚣繁华的远东大城市有着深刻的印象。1916年秋天，他随舅父易梅臣在上海住了数日，然后登上日本客轮，远赴东京开始他的留学生活。在上海期间，舅父易梅臣带他去法租界一处客邸拜会过革命前辈黄兴。田汉对他心仪已久，这一次竟能和这位革命党人坐在一起，亲眼看见他和三舅父易梅臣谈笑风生，心情格外激动。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三舅谈起准备带他去日本留学时，黄兴很关心地问他：“去日本想学什么？”

田汉从椅子上一蹦而起，行了一个颇为正规的军人礼说：“报

告黄大将军,我想修习海军,将来好报效国家!”

“好!年少志气高。”黄兴高声说道:“梅园,你这个外甥可堪造就。革命有如此青年后辈,定有希望!”

易梅臣在一旁连连摆手:“黄先生过奖了。他不过在辛亥革命那年参加了三个月的学生军,受了些军训,学了点术科罢了。真要去报考海军学校,只怕还不够格。”

黄兴听了,连连说:“那你这个当舅舅的,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易梅臣说:“黄先生有所不知,我这个外甥颇喜欢看戏,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就曾在报上发表过几个戏本。这次来上海,我带他去看麒麟童、高百岁、三麻子们的京戏,我看他十分着迷,只怕他此去日本,又会受这种戏剧罗曼蒂克的影响,误了正经的学业。”

黄兴笑了,说:“你不也是南社的诗人,如何又妨碍了你的革命活动?”

话虽如此说,可田汉毕竟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在日本果真转向学戏剧、电影了。

田汉第二次到上海是在1919年的夏天。趁着学校放暑假,二十一岁的田汉急不可待地回到了上海。这段日子里,田汉常随舅舅易梅臣和林伯渠先生去看京戏。他还忘不了出国前在上海看过的麒麟童他们的京戏。大都市的大戏院毕竟气派,台上演戏的那角儿,更是字正腔圆,唱念做打,样样精采,还有那舞台上的漂亮布

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跟真的似的。这一切，乡村草台班在庙里田场头演戏是无法与之相比的。难怪他每次到上海，总要过足戏瘾。上海让他开了眼界，使他能欣赏到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众多精华，正像他在东京能够接受到日本文艺界的许多新潮流，从受西欧文化影响的唯美主义派，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白桦派，到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派”，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等等，更有那剧场演出的世界名剧比利时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和德国新浪漫主义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沉钟》。

除了看戏，他在上海的第二个乐趣便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会，共同探讨艺术、人生、社会等等问题。在这里，他结识了宗白华、黄日葵、康白情、左舜生等人。田汉和宗白华特别谈得来，常拉他一起随易梅臣、林伯渠去看京戏。后来，他在日本东京，经宗白华介绍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建立了友谊，由此三人开始书信往来，后竟以《三叶集》为名结集出版，赢得青年读者的喜爱。不过此时，他和宗白华谈的最多的是德国文学大师，从歌德、席勒，一直谈到海涅等人，甚至还打算组织一个中德文化研究会。

田汉这次留学回国定居，选择了上海，恐怕是与上海给他留下的这些印象有关吧。不过，除了上海有精美的戏剧，有名人荟萃，有同道相聚之外，田汉看中上海的更主要原因还在于只有上海能够帮助他实现成为中国的席勒这一戏剧梦想。还在日本田汉参加郭沫若发起的创造社时，他就感受到了上海的众多书局对他们的

文学活动有多重要。田汉曾负责为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寻找出版的书局。他写信给左舜生，左舜生找过中华书局，找过亚东书局，都不肯承印。田汉尝到了碰壁的滋味，连创造社第三次筹备会也不去参加了。后来，还是郭沫若回到上海，四处奔走斡旋，终于得到泰东书局赵南公的支持，同意承印《创造季刊》，这才使创造社开展起活跃的文艺创作。田汉格外重视和珍爱，称之为“事实上是比较能介绍我自己的‘出世作’”《咖啡店之一夜》，就是发表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的。不过，由于这个剧本是《创造季刊》上错处最多的，田汉为此很不高兴，甚至疑心是郁达夫篡改了他的原稿，有意毁伤他在国内的声誉，便很严厉地要郭沫若替他把原稿索回，决意要在别的刊物上再行发表。幸亏郭沫若的一再解释和劝说，田汉才没有急切地要和郁达夫决裂。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看到原稿，证明郁达夫丝毫也没有更改，只是由于原稿上涂抹添改很多，加上排版的拙劣和校对的荒疏，才造成刊物错误过多。郭沫若把原稿寄还给田汉，这才冰释了田汉的疑团。

田汉携妻子易漱瑜在哈同路民厚北里 406 号住下后，便开始了编书、译书和创作戏剧的生涯。白天，他匆匆赶往中华书局编辑所新文化部，埋首于写字台前，忙着审书稿和编辑《少年中国》月刊等工作。《少年中国》是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刊物。田汉在东京时曾写过《俄国革命的经济原因》，舅舅易梅臣看了很满意，便向旧友李大钊介绍，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看

后还特意写信鼓励田汉。田汉受此鼓励，不久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东京的筹备组织工作。后来，他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诗歌和戏剧，使他蓄积已久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情一如东京上野的樱花一发而不可收拾地烂漫开去。如火如荼，云蒸霞蔚。他的话剧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和独幕话剧《薛亚萝之鬼》就都是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田汉自然对《少年中国》情有独钟，全力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不过，在他内心深处，他是不会忘记他所钟爱的戏剧的。所以下班回到家，田汉便又埋头于戏剧创作之中。

田汉在中华书局编辑所的这份工作是同乡好友左舜生介绍的，两人因此同在一个编辑室工作，朝夕相处，甚是熟悉。那个时候，左舜生正陷在与一个痴心女子的爱情而不能自拔，上演着一出爱情幻灭的活剧。这一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田汉觉得颇为有趣，心里便有意拿来写一个剧本。后来果真写成独幕话剧《落花时节》。不过此时，他更想把他和漱瑜在东京留学的一段往事写成独幕话剧《乡愁》。

提起他和漱瑜的相爱，田汉深深感到爱之艰难。他和表妹漱瑜从小就很亲密，常在一起议论文学和学校里的事情。久而久之，两人心里都产生了异样的感情。舅舅易梅臣察觉到了。他很喜欢田汉，觉得他可堪造就，就和母亲、妻子和姐姐易克勤一起商议田汉和漱瑜的婚事。不料，妻子嫌田汉家穷，说：“我就这么一个女